

历史

**DISPLAY  
BOOKS**

**A 4  
SIZE**

**100**

**DB100A**

但是在北方的匈奴并没有把武装解除，武帝在他统治的末期遂遭遇到类似瓦罗斯的失败。一位年青的骑都尉李陵曾向他建议出征蒙古高原。帝命其率步兵五千人自中国出发，经居延，额济纳河北流，向北朝翁金河方向行三十日。在达到浚稽山时，无疑即是今日的吐卜契山（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他被八万匈奴人所包围，骑射手们开始向他的小小队伍冲过来。在他被战败后向中国边境撤退时，游牧人的骑兵队紧紧地追赶着。“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但当败退的队伍刚要到达离中国边界只有五十公里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时至黑夜，李陵乘昏暗之际企图混入敌营，将单于杀死。他失败了，只有逃亡一途。能够逃亡而达到中国边界的不过四百人，其余的包括李陵在内则被敌人俘虏。这个消息传到时，武帝怒；史学家司马迁却还要偏护这个毫无计谋的李陵的名誉，因而他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李陵的失败”遂使中国暂时放弃了在外蒙古的“反攻式侵寇”政策。但这种精神上的失败（因为在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把甘肃边防置之于危险的地步。

值得我们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获得有匈奴人的这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坟中发现的遗物其中有镌着

牧人在军事上的优越性。所以，我们在后汉时代的浮雕上看到乌浒河外地的大马与小马在一起，例如在小汤山的浮雕上。我们应当注意到，在那时的费尔干纳还是在最后一批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手中，中国人所称的“大宛”是与希腊人的印变—伊朗名词Yavana，即Ionians，相近。

中国从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西伯利亚青铜牌子，据梅哈特的意见，在赤塔古坟中发现古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二、第一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是从那里有游牧群于秋季时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在冬季时所需要的物品。

在此后的时代里，匈奴与中国没有直接互相攻击于长城或蒙古一带，他们却去到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上互相角逐，即是说为了“丝绸之路”的控制而进行斗争。公元前77年，在罗布诺尔的楼兰王与匈奴结盟以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他即被捕杀，中国遂于该国的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49年）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受到一种决定性的刺激。大皇帝宣称：“汉自有其法，平服蛮夷之法是也”。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攻击匈奴于伊犁河流域以救乌孙。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庸，中国都护郑吉出兵平之。公元前65年，有中国另一上尉冯奉世将叶尔羌国王推翻，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尽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确实从吐鲁番王国撤回，而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时，郑吉将其再行占领。郑吉于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营后，自居于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他从那里控制着整个的地区。

结果，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管理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力量反攻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衰弱下去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至长安，要求宣帝支持，并宣布其为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

